

学林

← (上接3版)

本身,我们没能提出明确的结论。我们感觉到,用拓本作金文研究有一定的局限。另外,中国陆续发现很多青铜器,我们能够知道它们的详细出土情况。因此,我们即使不使用经过古董商人之手出现的、有疑问的金文资料,也可以研究商周时代的历史。

以上所讲的是林教授组织的、以先秦秦汉时期文物为主题的共同研究班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研究也获得了不少成果。林教授的个人研究有很多方面。其中,成果集成大部著作的研究有两个,即中国古代玉器研究和商周青铜器的编年研究。

日本的考古学者里,研究中国古代玉器者很少。或许可以说,玉器的专家只有林教授一个人。林教授从很早就开始关注良渚文化的玉器。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最晚期),他嘱咐我在南京打听北阴阳营遗址的发掘情况。后来,良渚文化的丰富内容渐渐地被公开,我才知道良渚文化的重要性,佩服林教授的先见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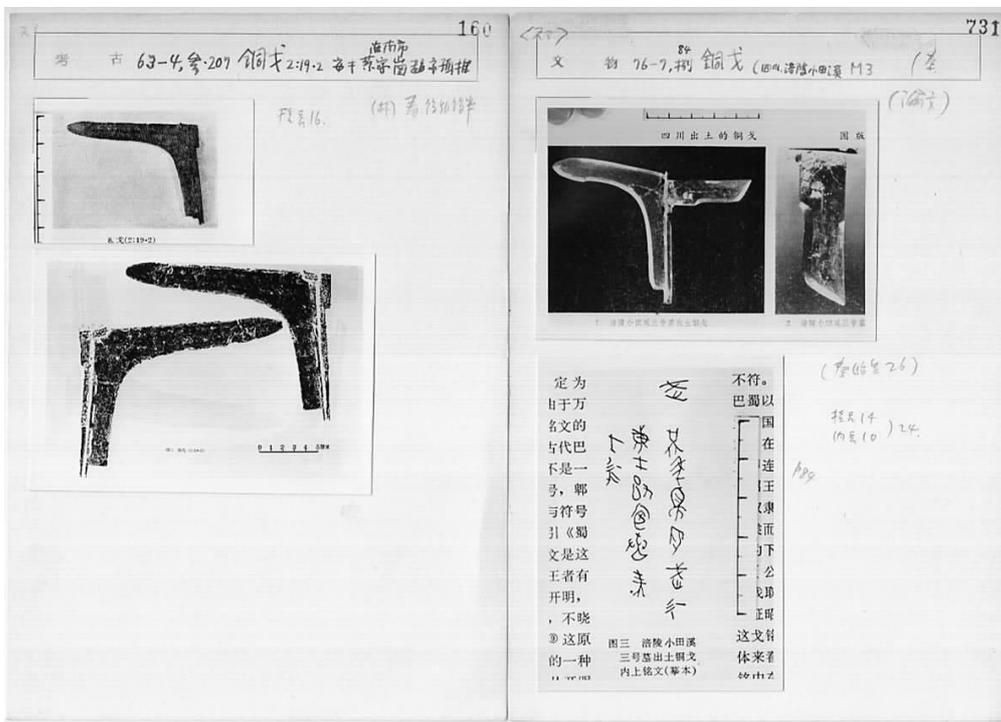
林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研究成果汇集在这次被翻译成中文的《殷周青铜器综览》中。我还记得林教授当年研究青铜器编年时的情形。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考古学共同研究室中间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林教授把很多贴了青铜器照片的纸质卡片排列在那张桌子上,不断地改变它们的排列。那时候的纸质卡片排列的结论,就成为了《殷周青铜器综览》的核心部分。他重视青铜器的“侧视形”,主要根据青铜器侧面呈现的曲线的变化确定青铜器的编年,尤其是西周早期到中期部分的编年,我觉得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当时看完《殷周青铜器综览》后,告诉过一位考古学者

我的读后感。我说:商代末年和西周初年很难分清楚,关于这个微妙时期的青铜器,《综览》把有些青铜器归在商末,却把很相似的一些青铜器归在西周,我不太明白这两者的区别。这位考古学者回答说:林教授喜欢的青铜器往往被认为是商代的,他不喜欢的青铜器大多被认为是西周时期的。我无法判断这位考古学者说得对不对,但与西周青铜器相比,林教授更喜欢商代青铜器,是事实。他认为商代青铜器是“天真”的,但到了周代,在青铜器的器形上能看到人的作为,因此稀薄了“天真”气息。

江村治树(龙谷大学文学部教授):首先要介绍一下我和林巴奈夫先生的关系。我在1975年被任用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研)东方部东洋考古学的助手,到1981年为止,担任林先生的助手。人文研答应让我做助手,条件是要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我本来在名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读博士课程,专业是东洋史学。我的硕士论文利用《史记》《汉书》等文献史料研究官僚制度。本科在神户大学文学部学习东洋史,当时的导师是伊藤道治先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人文研要我研究甲骨文。

人文研的助手是纯粹的研究助手。共同研究班是人文研的一个特色,助手要帮助联系各个班员。除此以外并不需要为林先生的个人研究做任何事情,只要做自己的研究,写自己的论文就行。因为我对考古学并不熟悉,所以关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我的知识都是林先生亲自教的。林先生对我的教育也费了不少心思,每次去日本国内的博物馆、美术馆调查青铜器、古玉器、封泥等,都带我去,让我学习测量文物、制作拓本、做记录等的方法。拓片工具的制作也是林先生亲自教我



图一 青铜器资料卡片(江村治树制作)

的。我有机会参加以文学部的樋口隆康先生为队长的阿富汗发掘调查也是托林先生的福。那次发掘是我唯一的发掘经验。不止如此,因为我每天和林先生见面,我从林先生平时的研究态度间接学习他的研究方法。林先生虽说是我的上司,但实际上是我考古学的老师。林先生把作为助手的我当作学者对待,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老师的架子。他对其他作为助手的年轻学者都一样,因此很受爱戴。

我在人文研当助手的时候,林先生正好为了《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 殷周青铜器综览一》(吉川弘文馆,1984)的撰写,进行青铜器的整理和分析。当时我经常目睹林先生工作的情形,今天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林先生的研究方法。

《殷周青铜器综览》是商周青铜器考古学研究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如此全面的考古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在林先生之前连中国学者也没有做到。

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认为,这部书最大的特色是对商周青铜器进行了全面的编年。林先生在本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讨论这个问题,其中最有用的是收录许多青铜器的器影和铭文拓本的图版册。依我看,因为有了这个图版册,商周青铜器的客观的编年才得到确立。林先生的编年方法,如第三节(中文版第206页)所说,是暂时不考虑纹饰和铭文,只根据器形(尤其是侧视形)的演变判断每种器物的先后顺序。通过器物的类型学方法确定器物的相对年代,这个方法在日本学界是在二战前的弥生式土器的编年研究中确立的。这个编年方法很客观,但只能确定相对年代。因此林先生还参考可以知道确切年代的铭文以确定器物的绝对年代。这种方法林先生早在《殷周时代的武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年)的附论(二)中采用过,林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设定了标准器,这个方法和地质学的标准化石的思路有共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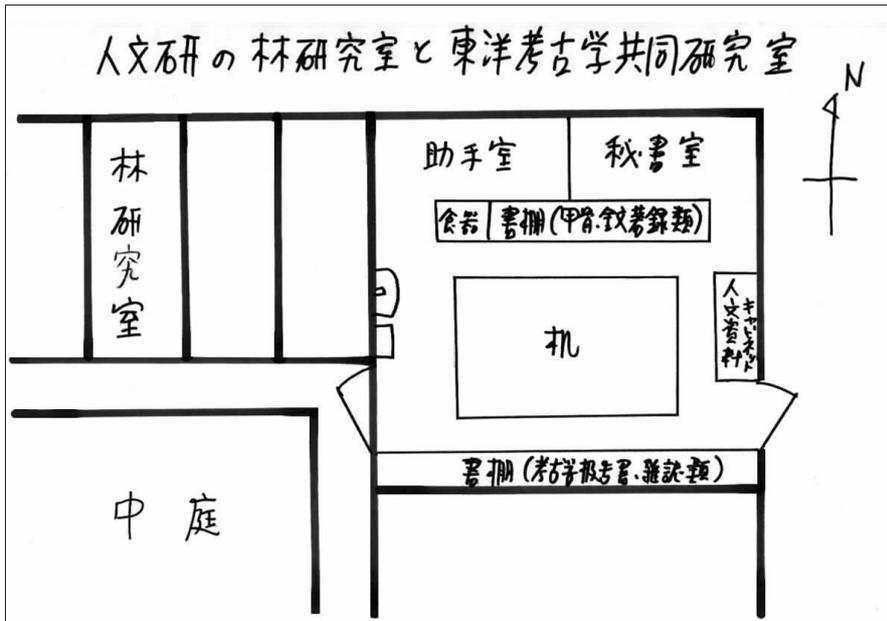
我认为,林先生能够完成商周青铜器的全面编年,除了林先生熟知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以外,还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人文研的研究环境。如本书《后记》所说,人文研有东洋考古学部门的三代学者(即梅原末治、水野清一、林先生)通过实地调查积累的中国考古遗物的资料卡片(即本书中经常提到的“京大人文研考古资料”)。此外,当时人文研的研究经费比现在充裕,而且研究人员可以专心做自己的研究。根据我的记忆,林先生要讲的课只有一门京大大学院、学部共同设置的考古学课。而

且林先生在人文研任职期间几乎没有写普及性著作(虽然退休后写了一些)。林先生利用充裕的科研经费制作了大量青铜器资料卡片(江村卡片的格式与此相同,参看图一)。林先生的个人办公室摆放着好多文件柜,每个柜子有四层,里面放着那些资料卡片。

每张资料卡片上贴着青铜器和铭文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有业务往来的照相馆拍摄的(有时复印书中的照片,有时去美术馆拍摄)。此外,人文研从二战前开始收藏大量的甲骨金文的著录书,至今仍然是日本最大的收藏机构(参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史部第十五·金石类)。人文研除个人的办公室外还有共同研究室。东洋考古学的研究室在研究所的东北角,研究室的一个角落用书架隔开,提供给助手。共同研究班在这个研究室举行研究会,中间有一张很大的桌子(参看示意图,图二)。桌子北面的书架里摆放着甲骨金文的著录书,南面的书架里摆放着考古报告和杂志,这些书是从人文研的书库借出来的,大家随时可以看。没有研究会的时候,林先生经常来共同研究室,在那张大桌子上排列照片资料卡片,考虑青铜器的编年。偶尔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把我从研究室的那个角落叫过来,给我说明。有一次林先生喊了一声:“江村,你过来一下。”我去看了,林先生笑着跟我说,西周青铜器的器形演变和女性的体型变化是一样的。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器腹都像年轻女性的屁股一样,很圆,紧实;器腹的形状随着时代的

人文研の林研究室と東洋考古学共同研究室



图二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林巴奈夫先生办公室与东洋考古学共同研究室